



事实上，大多数会议有会前和会期文件可供口译准备，但有时开会时却是全新内容。尤其在涉及人权、裁军等问题的答辩时，各国代表常常即兴发言，不时“吵架”，言辞激烈。口译员不仅无法提前准备，且不能有任何错漏，还要能译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达。

“所以，尽管每周有三个半天的休息时间，我们也要不断补充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词汇。”李正仁记得，有次他的一个同事开会差点迟到，匆匆忙忙进了“翻译箱”。正好是中方代表发言，会议讨论的是“橡胶”问题，但他却听成了“香蕉”，“当听到‘banana’的时候，全场哄笑。幸好不是太大的问题，他也及时改口，但他后来就被我们笑称为‘banana boy’”。

由于合同年限的关系，此前中国人很难在联合国做到高级别的职员。“P级职员里，最高级别是P5，需要有大约10年的工作经验。”李正仁告诉记者，一直到1991年左右，我国正式停止了只能通过推荐去联合国的规定，个人也可以和联合国续签合同或者终身合同。

就这样，李正仁一步步做到了资深口译员、中文口译负责人，级别也升到了P5。当时任UNOG会议管理部口译负责人任期满了后，李正仁有资格，也有信心竞聘这一管理职位，“当时，万国宫里隶属联合国本部的只有8个D1（Director，联合国高级管理人员），要求有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

初试的书面答辩顺利通过，李正仁最后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这个职位之前从没有中国人担任过，但我觉得自己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2007年11月23日，李正仁50岁生日当天。在家休息的他接到了UNOG总干事的紧急召见。到了办公室，总干事却只有闲聊。“我心里还不懂为啥要召见。”但没过一会儿，李正仁便收到了最棒的生日礼物。“突然，秘书走了进来，把一个文件夹呈给总干事。总干事当场签字，祝贺我担任口译负责人。”

2008年1月1日起，李正仁正式上岗。但新官上任，他的一个秘书仗着自己资历老，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很多原本要经过他审批的工作，这位秘书都自作主张决定了。这件事被李正仁知道后，立刻明确了工作流程和管理规章，从源头遏制了这一作风。此后，工作也逐步步入正轨。

多年来，李正仁每年要负责协调组织联合国六种语文的一百多名全职口译员和数百名兼职口译员；全年为日内瓦办事处负责的七千多场会议安排口译服务，负责过日内瓦以外的重



中国人担任的重要职位

1991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了一个5人名单，推荐他们去该组织教育部门任职。

2006年11月9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

2011年7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名任命中国人朱民担任该组织副总裁。

2013年6月28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正式任命李勇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此前李勇为财政部副部长。

2013年8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由此，徐浩良成为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最高级别的联合国中国籍官员。

2014年10月，中国推荐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新一任秘书长。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推荐的柳芳当选国际民航组织新一届秘书长。

2019年，前农业农村事务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

大国际会议的实际口译工作，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气候变化大会、荒漠化大会、裁军大会等。联合国人权机制下每年有近百次国别访问，翻译也是李正仁负责安排。

2017年11月，李正仁从联合国退休。深知口译的重要性，多年来他在培养口译专业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李正仁于2003年与UNOG口译负责人一道启动了联合国高校合作项目，该项目4年后升级为联合国外展项目，与全球23所培训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的院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今后，尤其在多边外交方面，中国要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口译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方案都是通过口译传出去的。如果翻得不好，那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李正仁表示。■